熊德明的新故事

怡 然

在喜庆十七大召开的日子里，读到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其中让我尤为感奋的是新华社一组图文并茂的报道：农家妇女熊德明今成养猪大户。

呵，好久没有熊德明的消息，现在终于又“见”到这位中国现代著名农妇了！不就是她吗？4年前，她在自己生活的小山村里，见到了前往重庆三峡库区走访的温家宝总理，鼓起勇气说出一句话：“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她告诉总理，她爱人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被拖欠一年，影响了娃儿们交学费……在核实情况后，总理亲自为她追工钱，坚定地表示：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结果，拖欠的工资被要了回来，而这个勇敢的农妇也成了大名人。孰料接踵而来的是诸多烦恼。一时间，四面八方前来请她帮助讨债的农民兄弟和众多媒体的采访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门槛。天生热心肠、淳朴的熊德明招架不住了，加上未能获得养猪的贷款，一家三口无奈地离家到重庆打工。当时一家企业好心为她全家安排了工作，她的职位是稽核干事，负责监督检查车间的规范化工作，丈夫进车间当技工，全家每月收入3000余元，住房也解决了。可熊德明却高兴不起来，实在难以适应陌生的工作和城里的生活，不久便辞职回乡，重新养起猪来。但马上又爆出新闻说，她被迫离开猪圈，跑到温州为老乡“维权”去了，直到被搞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怏怏然打道回府……

连演着一出喜剧、一出“哑剧”，幸运又可怜的熊德明，被折腾了好一阵，后来渐渐地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如今我们听到了她的新故事：近年来她安下心来重操旧业，在家乡贷款建起了养猪场，养猪数量超过100头，成为村里第二大养猪专业户，家里盖起了近160平方米的新房，购买了农用车和摩托车，今年收入有望达到6万元，一家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该为熊德明高兴啊！

被拖欠工资-讨薪-出名-务工-替人维权-重新养猪，熊德明的这个循环，这段经历，折射的正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积极解决“三农”问题，推行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所发生变化的发展轨迹。从总书记、总理亲自关心过问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清欠问题，到各级政府重视落实各项爱民富民措施，大大提升了农民务农的信心，这一点在熊德明及其一家的境遇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建设全面展开”，不是具体入微地表现在无数百姓的生活中吗？熊德明的新故事，不就是一个真实写照，一个生动缩影？

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人们能够各尽其才、尽其所能，能够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小康社会的雏形便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础就牢固了。恰如熊德明，她自小生活在农村，以务农为生、养猪为业，惟养猪才能展其所长，为其所乐，离乡离土，进城务工，委实是非己所愿，勉为其难。而她从偶尔出名后的烦恼、困惑和浮躁中摆脱出来，回归乡村、回归本原，力所能及、心情舒畅地成了养猪专业户，为社会“造肉”，为自己造福，这是农村大环境的改善使然，呈现了举国大力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出现的新气象。

当年，马克思曾描述过他心目中未来的理想社会：上午打鱼，下午艺术创作。其前提则是“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我想，倘千千万万的“熊德明”“牛德明”“羊德明”都能这样“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勤劳而安宁，平静而幸福地生活，不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康与和谐的图景！

世象杂谈

我思我舞

黄惠民

“一直到前天傍晚，当本书责编黄惠民老师催我快交这篇《后记》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的要出书了。”这是黄豆豆在自己处女作《豆志飞舞》后记中的第一句话。作为编辑，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断改动“再也不改的”稿子，还有那句“三思而改”的话，使我对他没有最后的截稿日。

黄豆豆是一位善于思想的舞者。他写这本书也是三思后进行的。他在第一篇文章《引子》中反问自己：“人的一生能完成几个自己亲手制定的‘五年计划’？一个舞者，又能在舞台上拥有几个五年？”因此，他为了完成这本书制定了第一个写书的“五年计划”。从2003年始，他在病床上、长途车厢内、飞行旅途中，前后花费了四年的时间，提前完成自己亲手制定的“五年计划”。

有种偏见认为舞者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因此学习一塌糊涂”。可是在黄豆豆写的《大学生活》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北京舞蹈学院求学时的学习思考：“我深知，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者，仅仅依靠几个过人的技术技巧与满腔的表演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我相信，舞者自身的文化修养直接决定着他(她)的艺术素养和作品质量，所以，我将迅速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列为在大学期间的头号学习重点。”对舞蹈之外的文化知识的渴求是黄豆豆的嗜好，他每次来我出版社书吧谈完书稿后总是倾囊购书。最令我惊讶的是，渴望成功的他，能在荣誉及鲜花掌声中静静地思考。在《寻根之路》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字句“我从获奖时的惊喜中渐渐平静下来，并开始以一个‘意外获得国际现代舞比赛奖项的中国传统舞者’的特殊身份，去思考正处于传统中国舞与西方现代舞交叉的十字路口的自己该何去何从？”“身为中国舞者的我，我的艺术个性究竟在何处？”

黄豆豆思索的不仅是艺术，还有生命，即艺术与生命。他在《窗外的天空》中这样写着：“我习惯性地推开窗，尽管略感凉意，但凝望着窗外夜空中正不断绽放的烟花，我不禁想到：与整个宇宙万物相比，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是多么的脆弱渺小；与所有日月星辰所能映照出的万丈光芒相比，一朵烟花所能照亮的夜空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所以，全体有志为艺术而甘愿自我牺牲的文艺青年们，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背负太多的世俗包袱，让我们共同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犹如此刻夜空中那灿烂的烟花一般：尽情燃烧自己的全部生命，只为照亮窗外那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刹那，至少那曾是一片被自己照亮过的一小片天空。”

人生旅途短如流星，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如何面对？年轻舞者黄豆豆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非常对话》中却像一位耄耋智者这样告诉我们：“在我看来相对于宇宙苍穹，人类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却往往可以通过自己创造的传世之作，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永生。”

难怪谭盾在《豆志飞舞》的序中坚信黄豆豆“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舞蹈家之一”。

收藏光荣

桂兴华

继续收藏

原上钢三厂，是世博会场馆的核心区域。那天，几个老工人在厂门口徘徊。

——题记

他们在收藏那些厂区大道旁的光荣榜。

他们在收藏那些在传达室门口准时开放的白兰花。

他们在收藏那些准时驶过身边的自行车铃声。

他们在收藏那些准时入队的一顶顶安全帽。

他们在收藏行车下一张张不锈钢的订单。

他们在收藏蒸汽机车旁的一道道工序、一个个班组。

他们还收藏夹在效率手册里的半支香烟……

看不见的思维，不一定没有吨位。

当年的办公楼和铺在车间里的铁轨已经消失。

用铆钉铆起来的庞大机器也已经转移。

此刻，谁翻出了一张北京群英会的合影？把闪耀着爱的炉火，把被烈焰的翅膀扑打过的工时，把共同的生命背景全部收进了背包。

他们在收藏品中成长。

他们没想到：自己也和化铁炉一样成了收藏品。

一位与他们同龄的保安对他们说：

这里将变成更大、更新的收藏馆了！

一位与他们的儿子同龄的厂长对他们说：

继续收藏吧！

新书架里的旧瓦片

装修一新的楼房里，主人特意放置的一块旧瓦片，十分醒目

——题记

人的一生，也许就是为了获得一片实实在在的瓦。

这片瓦，是老父亲弓下的脊背，是危棚最后的贫困，是岁月留下的另一种记录。

此刻，早已逝去的一夜夜的风声雨声，竟然与一本本身披盛装的新书并列着。

许多记忆的翅膀，就在这上面起飞，又在这上面降临。

主人真有心计：把它这位待遇最低的打工者，从电视剧里请了下来，让客人们经常打开来，细细解读——

想想悲凉的从前，好像天天在下雪。一旦起风了，下雨了，总担心它会坠落。

因为它习惯了忍受，习惯了在雨点的敲打中，伏在第一线，扩展家可怜的面积。

今天，它只是面积中的点缀了，稳稳地坐着，跟五湖四海打招呼。

它在对比。它更在提醒所有的眼睛——

不能仅仅关心这片积过厚厚霜雪的瓦……

茨威格的藏品

赵全国

茨威格爱收藏名人手迹，墙上挂着布莱克的素描和歌德的手迹，柜里藏着巴赫、海顿、肖邦的乐谱，还有莫扎特11岁时的手稿。他自杀后，藏品全流失了。现代人对此的第一感慨大约是：啊呀，这些藏品留到现在还不大发了！茨威格在天堂也会这么想吗？

那年读《看不见的收藏》，读得喘不过气。一位酷爱艺术的盲老汉指点着几百幅“名画”自豪地向画商一一展示，并说，他活着的时候决不许别人动这些画。他不知道名画早被家人为着生计而变卖一空了。当时德国通货膨胀，米珠薪桂，尽管双目失明，老人对生活的窘迫也不会一点不知，但他心里画就是画，是美，是艺术，没想过用它们来换马克。

很可能茨威格的心与他塑造的盲老汉是相通的，而与多数现代收藏家格格不入。

即兴一首

桂秉权

小堂独坐日光明，
翻书检报起经行。
隔室儿女笑谈乐，
投机无话不相亲。

游溪口

林子序

夹岸春花次第开，剡溪凝黛载青来。
是非成败等闲事，岁月风烟久释怀。
拔地凌霄千丈瀑，钟灵毓秀妙高台。
偏安一隅唯余梦，故里魂归旷代哀。

书法 顾忠成

今夜难以入眠 (油画) 陈逸鸣

青浦群众掩护我

林子明

1937年夏天我在上海高小毕业时，“八一三”抗战爆发，我和一位女同学参加女青年会护士训练班，后来参加了“战地服务组”，失去了升学的机会。邻居王仲夫是个共产党员，借给我一本《西行漫记》和《一个女兵的自传》，使我萌发了要求参加新四军的想法，1939年12月30日晚，王仲夫把我送到青浦顾复生的抗日部队。

1940年2月中旬，朱一带我和李毅到严家木桥村，住的一所小学校是党的地下联络点，我白天是小学教师，教学生读书，晚上就变成抗日战士，到各村宣传抗日，开展妇女工作。经朱一、李毅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浦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大家的革命热情依然很高。敌人常来扫荡和搜查，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有一次我们三人住在一户人家，他家有两个天井院，我们住在最后的一间。半夜敌人堵住了前后门进来搜查，住在前院的房东偷偷来告诉我们，鬼子来了快做准备。朱一很老练，化装成老太婆去帮老百姓烧饭，我和李毅二人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房东让我们躺在床上继续睡觉，并说如果敌人查问，你们就讲在上海××纱厂做工，是回来过年的。幸好敌人没有搜到后院，我们躲过一劫。还有一次朱一、李毅和我刚到联络站陆大勤同志家，没几分钟鬼子就来了，陆大勤同志机警地把三个孩子交到我们手中，我们每人抱一个小孩，混在老百姓中跑了出去。

那年4月14日，日寇对青浦进行大扫荡，顾复生带部队紧急转移走了，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凌晨大家还在梦中，忽然被老乡叫醒，我们赶紧躲藏在竹林里，向外看去，见晨雾里晃动着鬼子的太阳旗。老百姓又带着我们跑到荒野的树林里躲避，直到太阳落山。大家以为敌人已经走了，纷纷走回村庄，我们小心地走在后面，临近村庄时，看见一位脖子上骑着孩子的村民刚走到小桥中央，狡猾的鬼子从竹林里冲出来，用枪对准他。大家一见调头就跑，鬼子在后面大声喊叫：不准跑，再跑就开枪。我们不顾一切地拼命奔跑，下定决心宁可被敌人打死，也决不当俘虏。这时一位老乡提出邻村他亲戚家可以躲避，大家赶到那座村庄，见四处都是伪军，老乡们互相打招呼，我们也瞎招手，算是蒙混了过去。当晚我们商量不能久留要尽早离开，老乡提出干脆到伪军据点黄渡镇他亲戚家，可能更安全，大家觉得是个好主意，第二天清晨他悄悄带领我们到了黄渡镇，住在他的亲戚家，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老乡天天送来坏消息：日伪军扫荡严家木桥，把我们藏在草堆里的枪和书抄走了。日伪军用烧房子威胁老百姓，要他们交出新四军。老乡坚定地对我们说：“我们决不会把你们交出去的，要烧房子就让他们烧吧。”

后来我回到“新江抗”一支队，又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1940年8月新四军东路指挥部决定开辟澄、锡、虞地区，将一支队的工作队调到锡北张寨区一带工作。我从工作队员、队长、后任无锡张寨区委书记。由于青浦抗日斗争的历练，我可以独当一面地组织群众开展斗争了，那时年仅20岁。现在已是87岁的老人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青浦虽然只有短短5个月，却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从一个爱国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一生的道路。

十日谈 新四军中上海兵

明日请看《粟司令的音容笑貌》。